

英国工人阶级为什么喜欢读古典学

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1895)的主人公,是个拼命学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贫穷石匠。站在斜靠农村谷仓的梯子顶端,他凝望着克里斯敏斯特大学(虚构的牛津大学)闪闪发光的尖顶。裘德发现社会障碍是多么牢不可破,将他排除在精英文化之外,并使他的阶级地位永久化。

自17世纪末我们所知的“古典学”学科出现以来,只有富裕的父母才能为他们十几岁的孩子(直到19世纪末,只有男孩子)购买全面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所需的闲暇和漫长课程。这套课程可以赋予光荣革命后新统治秩序都认同的一套绅士风度。

但在同一历史时期,非精英的个人和团体实际上都在不断尝试,各显神通地自我教育。托马斯·卡莱尔就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他自学了古典语言和文学,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所处的历史时刻。

自1957年理查德·霍加特的开创性著作《识字的用途》和R.D.阿尔提克《英语普通读本》以来,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图书馆和档案、自学成才者的著作和成人教育的年鉴。其中最著名的是大卫·文森特的《面包、知识和自由》和乔纳森·罗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知识生活》。而古典学的素材也大量出现在英国工人阶级群体的身份建构和心理体验中。异议学会、非国教主日学校和卫理公会传教士培训计划都鼓励参与者广泛阅读古代史、思想和修辞手册。相互促进协会、成人学校、机械学院、大学推广计划、工人教育协会、工会和早期劳工学院的课程都包含古典学主题。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立法机构对工人受教育要求反应迟缓的情况:直到1870、1880年的《初等教育法》颁布后,13岁以下儿童才能普遍和自由地接受识字和算术方面的基本教育,更不用说接触古典文化了。

不过,其实很久以前就有另类的希腊罗马史。有几位古代作家,从奴隶和穷人的角度书写古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像李维,特别是他对共和国早期的阐述,还有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笔下的梭伦被誉为取消农民欠地主债务的英明领袖;普鲁塔克在克拉苏传中描绘的斯巴达克斯,在1830年代被视为无产阶级和废奴主义的英雄;爱尔兰共和主义者、宪章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同样消耗了许多种格拉古兄弟的生平传记,提比略和盖乌斯兄弟俩试图将土地重新分配给意大利的穷人。在社会主

义自由思想家弗雷德里克·古尔德改写的普鲁塔克传记集《给孩子的普鲁塔克》(1906)中,格拉古兄弟也出现在其中。

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叙述更是成为工人阶级自学成才内容的核心:一个年轻的矿工,曾是辩论与文学进步协会的成员,1899年遭遇煤矿倒塌事故,死时口袋里揣着修昔底德的译本,折角页是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

关于古典教育,争论的核心一直是阅读现代语言翻译的古典文本是否“算数”。到了1720年,战线已经画好了。那些不能或不愿为儿子的古典学教育买单的英国人进行了反击。不需要经年累月埋首文法和字典,就可以亲近希腊和罗马人。约翰·德莱顿和亚历山大·蒲柏等伟大诗人用母语翻译了古典作品。

蒲柏的译本让更多的工人阶级和妇女读到了荷马史诗,且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很快就流入了繁忙的二手书市场,而这些市场正是社会底层读者经常光顾的地方。

1730年,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震惊地发现,在英国,即使石板匠也会把报纸带到屋顶上看。石板匠很可能会大声朗读一些段落给那些文盲的同事们听;托马斯·潘恩的《常识》(1776)也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广为流传。

19世纪有许多面向大众市场的“大众经典”,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教育者充分利用了它们。1883至1899年间,伦敦工人学院在校长约翰·卢伯克爵士的领导下变得举国闻名。卢伯克列出了100本对一个工人来说最重要的书,其中古典作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此外,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乔治·格罗特的《希腊历史》,和当时最流行的古代背景小说爱德华·鲍沃尔-李敦《庞贝城的末日》,都在必读之列。

然而,古典翻译作品中最突出者,是约瑟夫·马拉比·登特1906年推出的“人人文库”系列。登特出生在一个有11个兄弟姐妹的工人阶级家庭,受卫理公会的教育。他相信,如果人们阅读经典作家的作品,世界会变得更好,因此,这种形式必须是工人负担得起的。人人系列在头50年里出版了1000种书,其中46本被列为“古典学”。

古典教育绝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专利,而是工人阶级生活中弥足珍贵、鼓舞人心的一部分。希腊和罗马的“遗产”在个人和政治事业的进步和开明上,都曾发挥重要作用。(编译自Edith Hall在aeon.co的“人民的经典”,编译/黎文)

贯苏州。昭和十年间来上海,现居愚园路贰佰壹拾玖号甜蜜公寓二楼202室。

这里明确了被封锁的甜蜜公寓的确切门牌是愚园路贰佰壹拾玖号。

作者对历史细节真实性的重视和事出有典的考证耐心令人感佩。也因此,才让本文起了较真之心。

小说中描写到的被炸弹炸死的汉奸丁先生(有丁默邨的影子,丁的实际住处是愚园路1010号,岐山邨施蛰存先生故居隔壁),主人公鸳鸯蝴蝶派小说家鲍天啸(谐音包天笑,鸳鸯派干将周瘦鹃即住愚园路),忆定盘路(今江苏路)、诸安浜路(今仍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惠尔康娱乐场(曾设愚园路1457号)等都是愚园路上的真实存在。既然小白令人钦佩地很认真地考证史料来进行写作,我们也不得不认真地来指出小说中一处不合适的失误,即将甜蜜公寓的地址设定为愚园路219号。因为愚园路上这个门牌号码的位置应在百乐门(218号)对面静安笔店(219号)。小说描写道:

巡捕几分钟后赶到。架设拒马,清查路人。又半小时,日本兵蜂拥而至,将大楼团团包围。巡捕房英国人起先还要争一争,劳莱斯装甲警车开过来,到底也顶不过日本人——他们派来了坦克。越界筑路地段,管辖权争执由来已久。从前日本人没打进来时,租界工部局一段一段租买地契,一段一段往中国地界修路。修好路就造房子。造好房子就有租界居民住进来,租界再派驻警察管治安。国民政府有心争,无力抢。终于达成默契:工部局修成道路上治安归租界巡捕房管,道路两侧治安归中国政府。但这一片发生刑事案件,中国警察向来不管不顾。工部局正好步步蚕食。

等日本人打进来,南京政府逃到重庆。租界当局就硬不起来。母国打仗自顾不暇,在租界,能维持体面就不错。越界筑路地段发生治安事件,租界偶尔也要争两下,弄到最后往往是丢光面子。西区就此变成外国报纸上所谓BAD LAND——歹土。

显然,小白是想将故事地点设计在越界筑路地区,且以此来营造小说的整体叙事场景。他对越界筑路地区和西区歹土的描写也符合历史事实。但他百密一疏,不知道愚园路大部分属越界筑路,惟包括百乐门及对面的这一段其实是划在租界里的,219号这个门牌也正好轧进租界里(可参阅1938—1941年间出版的《大上海新地图》《最新上海市街图》《袖珍上海分区村里图》等)。根

据各种历史学家的研究资料,以及历史上所发生的真实事件梳理,虽然《上海租界史》也记录了几次因针对游行经过租界的武装日军进行袭击或爆炸而进行的封锁,但总体说来,在当时属租界的地区(尽管日本人已进入了工部局警务处,且有日宪常住租界协力维持租界治安,北区犹甚),按照小说发生的年代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工部局的竭力抵制,日本宪兵是不大可能因为一个中国汉奸在房间里被暗杀而大举动作的,更不用说随意长时间封锁一幢公寓了。219这个愚园路路南门牌号码的公寓背后也不是布满棚户区的诸安浜路(该路过镇宁路,但未到地丰路,离219号尚有距离)。所以更合理些,倒是可以将甜蜜公寓的门牌设定为乌鲁木齐北路(当时的地丰路)以西大一些的门牌号码,那里确实有许多居住过汉奸的弄堂和建筑,也是真实发生过“封锁”的区域。比如668弄,它背后有钱家巷。比如749弄,它背后确实是诸安浜路,哪怕丁默邨的实际住处愚园路1010号,背后也有棚户区,都吻合小说中需要的棚户区场景,且1010号与汪伪高官云集的1136弄靠近,从安全起见,丁先生居此也更为合理。要设定为公寓,附近即有与甜蜜公寓环境相似的1054号久安公寓。虚构一个子虚乌有的门牌也没有问题,但租界地区与越界筑路地区的情况对于小说故事发生的真实性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正如小白《封锁》中自陈的:

汪政府中人偏偏就喜欢他,丁先生刚到上海,日本机关曾在四川北路替他找过房子,旁边就是日本兵营。他们几个一商量,婉言谢绝。因为在日本军队卵翼之下,等于自承是汉奸。却又不能住在租界,抗日地下组织密集,安全不能不顾。况且,说起来是打算租府,难道把政府开在外国租界?

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开进租界,12月10日,“维持会”性质的工部局才布告取缔政治恐怖事件的8条办法;其中2、3条言明,对出现政治性暗示的地段,予以无限期封锁,完全禁止出入;上述地段周围地区,同样禁止通行。日本人把过去在越界筑路地区的那一套完全搬进了租界。陶菊隐先生《天亮前的孤岛》“政治性的大恐怖”一节,对永安公司遭封锁一类事件有大量叙议。顺便说一句,小说结尾将真正的日本人林少佐之死定为意外而轻轻放过,其合理性也可再设计。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上接6版)

就读的圣玛利亚女中在紧邻愚园路西头的长宁路上,小说散文中多处出现愚园路的地名和景观,最典型的是《色·戒》结尾,王佳芝上了三轮车后要去的是愚园路,电影中被李安改成了“福开森路”)、王安忆(与父母同住过愚园路上的愚谷邨,《长恨歌》的灵感来自美丽牌香烟壳上的美女蒋梅英被害案,蒋即住在愚园路江苏路街道)、金宇澄(《繁花》中写陶陶和潘静到愚园路私会吃饭后到长宁电影院二楼舞厅咖啡吧小坐,恰遇失火险些丧命)、小白(《封锁》故事发生的公寓即在愚园路上),甚至还有茅盾(在愚园路259弄连生里和瞿秋白一起酝酿《子夜》写作)、林语堂(寓所近愚园路,在愚园路1283号公寓内的《天下》英文月刊当编辑)、周瘦鹃(曾住遭封锁的愚园路608弄94号)、施蛰存(寓所北山楼即位于愚园路1018号岐山邨弄口),他们的文艺创作都与愚园路有某种奇特的关系,甚至充满了愚园路的味道。“弄堂四通八达,人员五方杂处”,主要地处租界越界筑路地区的愚园路,其复杂性注定它要成为一条受作家酷爱的“文学中的马路”。

我们不妨再以小白的《封锁》来做一番分析。小白为了写他的《租界》和《封锁》,对上海史是下过一番真功夫的,据说在上海市档案馆翻过所有的工部局档案,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进行博尔赫斯迷宫式的精彩虚构和想象,完美地融会了历史真实和想象佳构,《封锁》获奖名至实归。但既然讲历史的严谨度,且有“小说中出场的任一元素无不与读者阅读期待中的‘历史真实’丝丝入扣”的评语,我们就不妨再严谨一些,探究一下小说的历史真实性。《封锁》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这个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汪政府中人还踌躇满志,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而且,因为南京中央储备银行“中储券”发行不顺利,跟军统正打得不可开交。两方面今天你枪杀两个钱业大亨,明天他朝银行扔一颗炸弹。

地点正是愚园路。小说一开始就交代:

林少佐命令封锁大楼,直至抓获行刺者。抓到,当然不可能。爆炸声一响,整个街区都乱了。愚园路转到忆定盘路,一过诸安浜,不要说三两刺客,一整支军队都能跑了。

在审问主人公鲍天啸时,更证实了故事发生地在愚园路上:鲍天啸。男。三十二岁。籍